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者文库

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形成的评析
(~~19~~世纪 ~~19~~— ~~20~~年代初)

龚云摇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序

龚云博士的新著《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形成的评析》即将付梓，索序于我。我为他的著作出版欣喜，欣然命笔以为贺。

《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形成的评析》是龚云的博士学位论文，原题为《~~20~~世纪~~80~~—~~9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取向》。他在求学期间，问学于我。我得以有机会与他共同讨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形成问题，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物史观在指导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能够接受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或者在讨论中互有发明。因此，我在指导他的学位论文期间，有一种教学相长的感觉，彼此均有获益，这使我感觉愉快。我们还合作完成了福建人民出版社组织的“~~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史学专辑”中的一种：《中国近代史研究》，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了学术史梳理。该书在~~2000~~年出版。

大体说来，中国近代史是在~~20~~世纪初开始形成发展为一门学问的。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它是一门较新的学科。处在不同政治环境下的学者们研究中国的近代史，处理近代中国历史史料，都会有不同的视角。他们的著作，在形成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中起到了各自的作用。其中，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形成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我以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史，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形成，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上是很有意义的。观察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怎样的历史著作和学派，观察前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独树一帜，对判断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今后的走向会有积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肯定他的选题和他的研究的。我

以为，本书对中国近代史从初步兴起、发展到繁荣及其学术体系的定型，做了一番很好的梳理。作者对李鼎声、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做的分析大体上是中肯的，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从兴起到发展到学术体系初步定型的论述及对其间各种学派的划分，大体上是站得住的，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把握大体上也是言之成理的。当然，这项研究还是初步的，可以讨论的地方必定很多。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读者会提出各自的见解和批评。我也希望，龚云博士在此基础上，努力精进，作出新的贡献。是为祝。

张海鹏

國國年 猿月 國日

导摇论

员源园—员源缘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屈辱与苦难，奋斗与牺牲，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是以这段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年轻学科。受制于中国政治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是指 员源园—员源缘年的中国历史。本书论述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指的就是以 员源园—员源缘年的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以 员源园—员源缘年这段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于 圆园世纪 猿园年代中国国难当头之时。面临外来入侵的严重民族危机，许多历史学家基于民族救亡的考虑，考察了 员源园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从中寻找救国之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风雨中，为了满足革命的需要而产生。随着 圆园世纪 源年代末中国政治的巨大变化，中国近代史研究获得新生的国家政权支持，得到较大发展，并在 圆园世纪 远年代初形成稳定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作为一门新型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在中国史学的百花园里成长起来，并成为一门显学。

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史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近代史研究继承了传统中国史学为政治服务的传统，从一开始产生，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历史科学，而且深受当时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和制约，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被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中，为当时的统治合法性提供历史证明。不同阶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往往集学术研究者 and 政治意见的代言人于一身，将学术研究当做政治斗争和实现救国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构筑的近代史研究体系，充分折射了当时中国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地渗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反映不同时代政治主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为与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而呈

现出不同的学术地位：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为国民党统治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居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居于学术边缘地位，只能构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由于新中国的成立，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派成为主流，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获得长足的巨大发展。因此作为记录、描述、阐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记载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行程，而且参与创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初，政治是中国社会的主题，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源于对中国现状尤其是政治走向的判断。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导范式是政治史范式：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近代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对经济、思想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也被赋予政治的功能和政治性的解释，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力量，尽量从政治角度去解释历史，重视历史的政治价值，其功能也主要是服务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

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清楚地说明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与 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密切关系。在总结 20 世纪近代史研究学术发展史时，不能仅从学术本身的演进脉络中去探索其学术发展规律，因为这种考察无法了解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本真面目。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去考察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轨迹，对其发展进行学术史和政治史的双重考察，更能获得历史的真谛。

基于上述原因，本书尝试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角度，考察 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取向。目的是通过对这一期间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形成、发展的学术政治史考察，总结中国近代史研究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关系的经验教训，为 21 世纪正确处理中国近代史研究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提供历史借鉴，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发展。

本书对 20 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政治史的考察，选择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初这一历史单元，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本书研究对象是对以 1911—1949 年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形成、发展、定型的历史考察。这种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发展、定型的。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兴起，20 世纪 60 年代

初，代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定型的著作出版；第二，这一时期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也是 20 世纪中国政治变化最剧烈的一段，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尖锐。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进行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场民族战争——抗日战争，并经过长达八年的民族战争，最后获得了胜利。民族救亡，创建民族国家是这一时期的政治主题；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国阶级矛盾极其尖锐，这种矛盾最后发展到长达三年的国内战争，一直延续到 60 年代初。中国政治发展也被置于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冷战的政治格局中。政治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一切都被纳入这一主题的控制中，包括作为上层建筑观念形态一部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这种政治语境下，中国近代史研究显现出高度政治化色彩。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也正是在这一大的政治变动中形成的，其走向受到中国政治发展的极大影响。在政治矛盾极其对立的历史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从自身政治立场出发，构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并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反映到其论著中。

因此本书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形成、发展、定型置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初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演变中，通过对这一学科体系形成过程中，中国内地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不单纯指学者）代表性的中国近代史论著文本分析，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变动如何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如何诠释中国近代史，并借建构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产生的政治语境与学术基础	1
一、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产生的政治语境	1
二、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产生的学术基础	1
第二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兴起	1
一、时代的呼唤：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兴起的政治背景	1
二、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兴起	1
(一) 反映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1
(二) 反映自由主义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1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崛起	1
第三章 20世纪 50年代—7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形成	1
一、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形成的政治条件	1
二、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形成	1
(一) 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形成的史料基础	1
(二) 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基本问题讨论	1
(三) 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定型	1
结束语	1
参考文献	1
后 记	1

第一章

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产生的 政治语境与学术基础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历史，学术界通称为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历史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说，是世界主动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这1840年历史变化的深度、广度、剧烈程度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推动力，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中国向何处去”是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旋律。对这1840年中国主题的回答，是现代化，还是革命，不仅决定于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也与对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的历史思考相关。因此对这段历史的考察，不仅是一种历史认识，还是一种现实实践。毕竟，对现实中国的认识往往影响着对近代中国的判断。

因此，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相表里：一方面，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尤其是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决定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又影响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因此，对这段历史的书写，不仅受制于客观历史进程本身，更受制于研究者必须面对的现实政治环境。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的兴起源于现实中国政治的需要，其定型取决于现实中国政治民主化创造的外部条件。中国政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构成中国近代史学科兴起前的政治语境。

同时，中国近代史学科毕竟是一门知识形态，是历史研究这种精神生产实践活动的产品。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作为研究主体与历史研究客体的互动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卷14，光绪三十一年金陵本，第11页。

作用。作为历史研究结果的历史学，必然同研究主体的状况密切关联。研究主体要遵循学术规律，有为政治所不能完全左右的独立精神，否则就不能算真正的学者。任何一种知识形态，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在现有的知识基础上产生的，都有其学术渊源。中国近代史学科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新兴重要分支，既继承了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又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产物。因此，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产生既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产物，又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结晶。

一、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产生的政治语境

历史是一条河，与现实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深受现实的制约，以刚刚发生的历史为对象的近代史研究，更与现实有着须臾不可离的关系。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对话”，“亦即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解释，他对于有意义的和有联系的东西的选择，是随着新目标在前进中的不断出现而改变的”，“只要主要目标看来还是宪法自由和政治的目标时，历史学家便以宪法和政治为根据来解释过去。当经济和社会的目标开始代替了宪法和政治的目标时，历史学家便转向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解释过去”^①。英国历史学家巴拉克劳说：“现在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历史家能给他这一代什么东西，他准备在什么程度上来满足那种希望在历史中发现解决当前任务的关键和指示的要求。”^②美国学者武德瓦德在《重新解释的时代》中认为：“过去没有任何时代像这样迫不及待地渴望从历史上去领会和加以解释，从而对历史学家有过这样多的要求。这个时代所要求于历史学家的是要求他们回答加速发展的历史进程所提出的问题，即关于过去与现在和未来的关系问题。如果现在的历史学家规避这个问题，人们就要转向别处去寻求回答，那他们就有资格承受托尔斯泰曾送给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学究的称号了——托尔斯泰把他们叫做在回答谁也

① [英]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 135、136 页。

② [英] 巴拉克劳：《扩大历史的视野》，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56 年 1 月 6 日。

没有问过他们的问题的聋子。”^①

近代中国是一个转型社会，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旧体制被打碎，新制度不断建立，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规范不断式微，新的生活景观和道德秩序不断形成的新陈代谢史。新陈代谢的主题始终围绕政治变迁展开，政治文明的转型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主干。社会的根本变革，决定了学术文化的内容及其走向都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迁。诚如龚自珍所言：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政治发展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题，向近代史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解决的问题，近代史研究者也自觉地把目光投射到与他们最近的历史——近代史，去那里寻求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答案。因此，现实政治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产生的历史前提。

近代中国是在有着几千年高度封建集权政治传统基础上，在西方冲击下开始蹒跚地行进的。君主专制的政治传统，使传统中国形成一个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社会，政治权力直接干预文化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泛政治化，就是这种专制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整个传统文化中，政治伦理学极为发达，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文化内涵的实质是专制主义的，与专制集权政治互为表里，其功能主要是维护封建统治。奠定中国古代文化基础的先秦诸子文化，正如司马迁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的那样：“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以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② 中国文化的泛政治化——政文合一的结果，使文化丧失了独立地位，成为权力的奴婢、政治的祭品，君主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因此中国古代不存在独立的认识主体，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学术从终极意义上讲也是从属于政治的。中国文化的泛政治化特点，使得传统中国政治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士”在政治—社会现实中的主导作用。中国通过科举制度，以通晓经史、文学的“文士”为官僚政治来源，这是一种可称谓“士大夫政治”的独特帝国模式^③。正因为如此，钱穆认为中国传统中政治与学术绝非为两概，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的实际措施为主要关怀的对象，中国历代所制定、实行的一切制度，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④。钱穆还

① [美] 武德瓦德：《美国历史评论》，1960年10月号。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 张仲礼：《中国绅士》序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译本。

④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三民书局，1969年版，第65、28页。

在中国历史中发现一种一贯发展的理想趋向：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治的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中国历史遂能稳步向前，以日臻光明之境^①。传统政府是“士人政府”，传统政治是“士人政治”，历代政治主张多具有学术思想渊源，由于强调学术领导政治，所以钱穆认为学术界与教育界所形成的道统地位应是政府所形成的治统之一。钱穆的观察虽然有美化中国传统政治的一面，但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高度政治化的一面。这一传统也为近代中国所承继，所谓“好人政府”、“超一流人才内阁”就是这一传统的再现，反映了学者不安其位的心态。在这一政治文化传统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角色的自我认同方面，政治功能被极端地强化了，“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最高价值取向。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通常被称为儒生或士大夫，“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子当官犹如农夫耕地一样天然本分；“士之失位也，犹之诸侯失国家也”^②。儒家将入仕做官摆到行义的高度，“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而行其义也”^③。由士而仕，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在封建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政治的功能。以臣助国君，替天行道，成为中国士大夫理想的人生取向。中国知识分子虽然间或有做学问的兴趣，但学问中所蕴涵的政治功能要比自身的学术功能更能体现学问的价值。中国的学术带有强烈的实用理性倾向。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是切近现实人生的道，不仅“文以载道”，而且“格物致知”，也应“当求诸心不当求诸物”。失却政治伦理价值的学问，也只是“坚白之辩”和“奇技淫巧”。科举入仕，治国平天下才是文人天经地义的正途。“为知识而知识”的学问兴趣则多少有“怪癖自弄”、“玩物丧志”的嫌疑。这一传统到了近代，仍然像梦魇一样萦绕于文人之脑际，所以鲁迅认为民国的学界亡魂仍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脸，打官话”^④。集权政治下形成的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积淀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构成中国近代史研究根植的历史土壤，又在近代中国激烈的政治情势下得到强化，

①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三民书局，1969 年版，第 64 页。

② 《孟子·滕文公下》。

③ 《论语·微子篇》。

④ 鲁迅：《华盖集续编·学者的三魂》《鲁迅全集》（三），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06 页。

左右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了。”^①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近代中国学术之主干。

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帝国紧闭的大门。此后一百多年，华夏大地进入了多灾多难的时期。帝国主义为了彻底变中国为殖民地，一次又一次发动了大大小小的侵略战争。不甘屈服的中国人，面对列强的侵略，一次又一次掀起反帝反侵略的战争。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人们常说的近代中国的两大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与文明。因此，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最要紧的难题莫过于政治。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群体中最敏感的一族，特定时代的主题往往是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政治就是他们关注和焦虑的核心，建立秩序良好的政治生活一直是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使他们在“无形中养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即以为只有政治才是最后的真实，学术则是次一级的东西，其价值是工具性的，这种观念在近代史上的表现便是把一切文化运动都化约为政治运动”^②，由此决定其学术旨趣主要是聚焦于政治一面。正如王国维评论梁启超，“梁启超对学问的关怀并不依赖于其本身的价值，而在于其政治上的目的”^③。

为了实现近代中国政治主题，中国社会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方式完成了民族独立，并围绕着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的两种道路展开激烈的斗争。因此中国近代显现出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特点，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强烈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政治通过调节各种社会关系来调节学术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以法律和政策的发展方向，制约着学术目的和学术建制的相应方面；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决定着学术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制约着学术研究取向的选择和学术主要研究范式的地位；政治也支配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和社会条件，等等。政治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题，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在知识分子中普遍

①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页。

②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③ 转引自陈少明等：《被解释的传统——近代思想史新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激起“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得益于传统中国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而且在西方民主政治的“主权在民”原则中找到了印证。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比一般民众更能认识到中国的民族危机虽然是由外国侵略者造成的，但是与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弊病也有关系。欲救中国，需要的是从政治与思想等方面全面改造中国。对他们来说，一方面，“政治解决”是近代中国最基本的救亡方式；另一方面，在政治革命遭挫的情况下，他们又从文化的意义上来思考政治，认为文化启蒙是政治改造的前提，要通过思想革命来改造国民，为政治现代化奠定基础。为此，他们在近代中国多次发动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运动，批判落后的国民性，宣传新的思想和新的道德观。学术成为对民众进行启蒙的工具，也是知识分子救国的武器。梁启超把新学术看作是能够改变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号召知识分子积极改造对社会有用的新学术。在他们看来，作为旧文化一部分的旧学术文化，是旧制度的工具。因此，批判旧学术，建构新学术，就成为对全社会进行政治鼓动和启蒙宣传的手段。这就使得中国的学术与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了。新史学的出现，就是因应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改造旧史学的目的就是为现实政治，就是为了鼓舞人民爱国、救亡之心。梁启超认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史学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①“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义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上。但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②知识分子以救国为学术目的，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学术的政治化与政治的学术化特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就一批学者欲总结近代中国历史、探求中国政治出路的产物。

近代中国在外来强权的刺激下，变成了一个畸形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下，近代中国政治开始转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显现的，表现为政治结构的解体与重组、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一个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九，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版，第 7 页。

②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5～16 页。

方面是隐形的，表现为隐藏在政治变革里层的政治理念、政治哲学、政治话语等观念形态的流变。政治的转型，使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一体化结构有所松动。文化开始摆脱政治强权的控制，获得政治之外的一点独立领域。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科举制度的终结，中国知识分子的职业开始多元化，学术研究在中国第一次成为一门职业。知识分子自我价值实现，可以不必向外投射于政治，而转向学术本身。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由专制开始走向民主，为学术提供了一定的独立空间。所以蔡元培才可以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宣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① 朱自清也认为：“‘五四运动’后，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途。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② 但是近代中国社会从整体而言仍然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一元化社会。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学术界不可能成为左右国事的独立力量，而且其内部事务经常遭到政治强权的暴力干涉。知识分子们虽然想在保持学术独立的前提下，在政治外围组建压力团体和“舆论参政”，但在冷酷的现实政治面前一再饱受挫折。在救国成为时代的主题情况下，即使在学术上做出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在良心上总有一种深以为疚的欠债，有一种愧对人民，愧对国家的忏悔意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哲学家汤用彤在《大林书评》中自责说：“时当丧乱，犹孜孜于自学，结庐仙境，缅怀往哲，真自愧无地也。”^③ 卢沟桥事变后，弘一法师李叔同更深谴自己，“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人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困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④。所以中国学术只有当政治不再成为社会主题，政治高度民主化，政治与文化高度分开时才能赢得相对独立发展空间。

知识分子，尤其是在西方受过近代政治观念洗礼的知识分子，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在社会中有很大的能量，往往推动中国新的政治理念的生成，因此为各种政治势力高度重视。对统治阶级来说尤为如此，因为

①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载《东方杂志》，第14卷4号。

② 《朱自清文集》，香港1964年版，第192~193页。

③ 《汤用彤传略》，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

④ 《李叔同·民国人物传》第3卷。

“一个统治阶级越是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会越是巩固，越是险恶”^①。

中国近代社会的高度政治化，使中国近代社会科学作为知识形态，极大地显现出意识形态化色彩，而混淆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的差异。社会科学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但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体现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按照特定阶级的价值尺度去描述和解释世界，其核心原则是阶级性，而科学性则要求从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去描述或解释世界，其核心原则是客观性，即符合客观世界的真实联系和规律性。由于中国近代史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人们自然把它视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作为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②。他们从历史的角度把统治阶级的特定利益描述成代表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把其思想赋予普遍的形式，通过教化，渗入到社会每个人的头脑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他的思想的界限也就是他所接受的意识形态的界限”^③，人都是漂浮在意识形态之中，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④。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各阶级都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他们运用各自的意识形态，“或者为这个社会辩护，或者批判这个社会，成为维持、改造或摧毁这个社会而采取行动的依据”^⑤。在中国近代政治成为社会中心话题的这种社会状态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潮、普遍的社会心理，尤其是各个时代的纷繁多变的政治意识形态，构成学术生存的特定的语境、特定的精神气候。这种语境，以一种深潜的方式，规定和制约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更直接地左右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们，以一种史观的形式，成为不同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影响着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判断和评价。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由于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加剧，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③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④ 阿尔都塞语，转引自金安平：《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⑤ [法] 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纷纷从自己的阶级、阶层立场出发，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知识分子论争的焦点。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主导意见。政治救国论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政治救国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景观。

近代中国被迫开放后，西方近现代的各种思想流派纷纷传入中国，成为各个阶级构建自己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近代中国社会各种意识形态杂然纷呈。现实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同思想流派为了争夺解决中国出路的主导权，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大论战。19世纪末期，维新派和顽固派围绕中国是否应该变法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围绕中国是否应该革命展开了论战。辛亥革命遭挫后，知识分子将救国希望寄托于国民性改造，从文化着手去解决政治问题，为此他们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社会的趋向改变了……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①面对如何改造社会，是否谋求根本解决的办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面对中国社会改造问题，是否采用革命的政治斗争来解决，中国革命是否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又掀起了社会主义论战。论战的焦点在于当时中国该不该发展资本主义，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代表封建、顽固、买办势力的国民党反动派和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共产党围绕中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不仅在武装领域，而且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两大势力之间，代表广大中间势力的政治流派，尤其信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借助于舆论工具，写文章，发宣言，表达自己的政见，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希望中国能够走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此，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主要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的历史语境。在中国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情势之下，一切阶级，都自主不自主地在这场斗争中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有的学者直接用一种意识形态指导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并借对中国近代史的评价反映自己的政治观点。在这里，中国近代

^①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载《新潮》第2卷第1期“附录”，1919年10月。

史研究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借学术来促进政治的运行，从而带有强烈的政治取向。

有的学者站在学者的立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持客观主义态度，将自己的政治立场深藏在学术研究背后，他们的研究具有高度学术色彩。但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之下，他们也在自己的著作中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为学术而学术”的立场固然存在，但作为现实中的历史研究主体，也会对现实表明自己的态度。历史学家对待历史不会像诗人描写的埃及人面兽那样，“坐在金字塔前面，注视着各民族的刑场、洪水、战争与和平，从无面目的表情”。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漠不关心，本身就表现了对斗争的一种立场，诚如列宁所说：“政治上的冷淡就是政治上的满足。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已经永远不愁面包，永远不缺少面包，而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党性不过是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①“……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家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个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像期望在 shouldn't 用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工人工资的问题上有公正的工厂主一样愚蠢可笑。”^②

历史学是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更是研究刚刚过去的历史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具有社会意识形态属性，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政治制度，打上特定的社会形态的标志和烙印。由于社会事件是有利益倾向的，因而研究者所属的阶级、民族或国家的需要使得社会科学理论具有阶级性、党派性、民族性。一个史家对历史的看法和认识，反映了这个史家对现实世界的态度和愿望，也就是史家的阶级意识在历史学上的表现。任何阶级的史家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用他们自己的阶级观念去分析历史问题。因此在这种多元的政治意识背景下，不同阶级的史家会主动地或不主动地以某种意识形态作指导，作为观察和批判历史的出发点。“把历史研究作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的史家，他们往往从现实需要出发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8页。

②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www.ertongbook.com